

序 言

中国当代学术之变化有迹可寻，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始而渐入精微，此固与学术演进的趋势相关，也得益于规范化意识的倡导，与之相随，在方法、观念与视野等方面也均有新拓。落实至具体的研究中，这一变化也表现在对各历史环节、段落、层面等的重新考察。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鉴于某种特殊性或学科的惯性，新一轮的研究往往多与对“流派”“思潮”等的系统梳理联系在一起。我也曾撰文称此类研究为“中段”研究，既有别于年鉴学派所主张的长时段研究，又比各种事件性、案例性研究所限定的范围要宽。就大体的过程来看，先是有对公安派、唐宋派、竟陵派，进而是对复古派、台阁体派、茶陵派等做逐一的细察与“正身”，最后，至 21 世纪初，则又将研究延伸至明中后期的吴中派。这种层累式的递进，使明代文学研究的景观有了极大的改变。

从已知的情况，也是从后来者的视野看，吴中派在整个明代文学序列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其为整个演进序列所提供的意义也是不能随意缩减的。然而在此之前，它在学科研究上的处境却是相当尴尬的。正如我们所见，吴中派在很长的时期里不仅不为文学史与批评史所容纳，甚至未有一正式的赋名。举例而言，比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内容达 800 多页、由袁震宇

等主编的《明代文学批评史》中，竟然未见对之做任何的标目，更遑论有相关的陈述。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明中期的吴中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偏附一隅，属于地域性流派，不像上述诸流派均在甚短的时间内即腾升显形，主导过一时风尚，而且其更替方式也有环环相扣、逐节生克的特征，便于纳入到历史的单线进程中去观察；二是吴中派诸子多长于艺事，故当其为另一领域的艺术史所刻意标榜之时，也会相应地遮掩其在诗文学上的造诣，这种情况在其他研究中亦不少见；三是材料的零碎、意义的弥散等，尤其是缺乏一个流派一般会具有的比较集中的、标志性的批评主张与概念；四是前期的学者多会受到学术理念上的限制，常以狭隘的现代性标尺为遴选、评判史实的依据，以致不仅无法兼顾多样丰富的边缘化经验，也无心细察多种线索在特殊纠缠与组合的情形下对主导性历史进程可能给予的切实影响。正因为此，在稍早一些年代中，我本人曾也有所窥入，在努力发掘各种散珠般史料的同时，试图将之组织与统合成可理解、可确认，并具有某种贯通性的意义系统，以期借此而使这一段隐身的历史曝露于可视的光亮中。当然，凡属总体化的处理也会存在诸多的问题，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将那些杂枝多蔓与凸凹不齐的材料打理为一个明晰的序列之后，也会同时消泯个体事实所固有的坚硬性，在将那些涌动着的不和谐性转化为了一种学术上看似比较平整的外观之时，会遗弃原有的诸多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需要有一种回旋式的过程，即从整体而至诸多的特殊，再从诸多的特殊返回到整体，经由这种来回滚进式研究，才能逐步在兼顾特异性的同时疏通一个流派的复杂脉络，既由中发现个体又能窥得整体，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连贯与断裂等。而这一工作无疑是需要多个学者的协作才能推进的。

徐慧对祝允明的研究，瞄准的是吴中派中的一个个案，可看作是这一整体协作工程中的重要一环。但这一个案却是吴中派系脉中最具批评标本意义的，或从某种程度上看，也几乎是吴中派诸重要成员中最难下手的一位。关于吴中的地域文化特征，古来载述即夥，多以为此地风物清嘉，盛产才情隽发之士，以“东南竹箭”一语称之似无过之。然此类才士的特征又多会偏向于对具体性的敏感，比如擅长艺文、考训等，而疏于思辨的耽沉与理义的抽演，取之与邻近浙东一带的文士相比较，便顿时可见出两地人才于禀赋上的差异。明中期的吴中之士也基本上合乎以上概括，或也正是因此，其在批评学上多缺乏明显的建树。但祝允明却几乎是一个异数，不仅善于思辨，而且也有一套成型化的理论言述，为此而可借之以察吴中派在特定时期的一些观念流向，故可看作有“标本性”的意义。对祝允明研究的难度，则首先与其所操持的文字有关，祝氏不仅嗜古甚深，而且也视赵宋尤其是明初以来的近体为俗为伪，以故在其书写上往往追求一种艰涩斑驳的语体，即评者所谓的“深湛棘奥”“精覃绮郁”云云，这也自然陡增了对其文本阅读的难度。再一就是思想上的丰杂，这或许是因前后表述不一，或刻意制造出一种含义上的缠绕、曲折，遂使得对其一部分著述的知解总是需要颇费心力，唯有多遍逐字逐句地来回参读，方能疏通其大致的理路。另外的难度，还在于在此项研究起步之前，其他明中期吴中派成员的个案几乎未曾被人细勘，传主外围的许多情况都需要自行摸索，在建立起大批可资参照的信息坐标之后，才能发现祝氏与同时代人物之间的多层联系，并将这些返递到对传主的思想考察中。然而，有幸的是，正如我们所见，徐慧之才与力均足以应之，从而顺利地完成了为自己所预设的目标。

当然，对祝允明的研究也涉及一些方法论上的究讨。记得当时与博士同学一起论学，语及最多的便是诸如“语境”“关系”“谱系”“深层逻辑”“观念史”“层次”“文本体制”“主导与边缘”“地方性知识”等的概念，这也与新一轮学术观念的重建有密切的关系，以期能够从旧的、粗糙的实证主义而转入更为精细与深密的实证主义。其中，还有一个带有一定聚焦性的概念，即“脉理”，这一概念既重叠了上述有些概念的含义，又多少主要与对流派、思潮的治理有特定的关联。脉理，不是表面可见的“纹理”，而是流派在持续塑形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内在话语”。在徐慧的这本论著中，我们已可看到其对个案研究的一些新的处理方式，不仅重视裂隙、个性、个人经历等问题，同时也能自觉地将人物置于多重穿越的脉理之中去加以探察，以便由此发现人物与不同脉理之间的脱臼与勾连、抗拒与修正、相互影响或相互建构等的错综关系。比如在“文”的系列中，祝允明的复古观哪些是与吴中文士共有的抵御时文的地方性意识相接续的，哪些又是与另一层面上的外在脉理如前七子抗拒宋明文非地方性意识相契合在一起的；又如在“诗”的系列中，祝允明的诗学观哪些是与吴中尚意、主意的传统保持一致的，哪些又是受到复古主义思潮的侵扰而有所调整，并创建起一套有所特殊的话语逻辑的，等等，都属于这一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只有将传主与各种穿梭往来、不息行进中的脉理之间所持有的那些或平行、或歧出的关系等一一甄别清楚，并在解释上予以疏通，才有可能为祝允明思想寻找到批评学上的合适定位，以及将其楔入于某种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准确地揭示出来。反之，如稍加恍惚，便易将不同层面的线索混淆在一起，造成脉理判认与梳理上的差缪。措举如此，我当然不是指徐慧的考订已无可挑剔，而是希望借助这一说明，看出徐慧论著中

方法论探索的一些特征，以及当年“我们这一群”在追寻新的学理路径上曾有过的经历。

曾忆得，徐慧十年前来京问学，还是一脸的青葱，掌心中掌握的是对未来的信心。当时一起在校就读的大约有七八位古代文学的博士生，也常在夜间的读书会上交流心得，寻疑探实，发声朗朗。徐慧也总能如期地带来一些自己的“疑窦”，小击大扣，旁敲正询，可知其平时读书勤奋，善于深思。徐慧关于祝允明的论文完成于七年之前，然而似并未有付梓之意，也曾记得她带着有些茫然的神情问道：“著作目前的状态可以面世了吗？”由此也知其对自己的研究严于自审，有更高的志向。如此又过数年，徐慧适庐造访，告之这项文业终于结案，以此而可了却多年的未遂之愿，并嘱我为序。近岁以来，我之学术也有迁移，缅想畴昔与诸生共学时光，不禁恍有隔世之感，也兀生几多惜阴之叹，只能勉为振作，聊附数语于上，既为钩稽往尘，也为以庆功竣。

黄卓越
乙未夏于京北